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六辑(2017年第2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超越新经济史：诺思的学术贡献

刘瑞华

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布：基于1776~1953年间人口数据的实证

汪建雄

内生制度绩效的跨文化差异：基于非物质偏好的分析框架

李志云 朱宪辰

企业家激励、隐性契约与创业型企业融资

吉云

中国情境下企业广告策略与研发战略的逻辑关系

汤二子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六辑 (2017 年第 2 期)

黄少安 主编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7 年. 第 2 期: 总第五十六辑/
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141 - 8100 - 5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制度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91. 34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8963 号

责任编辑: 宋 涛 王新宇
责任校对: 靳玉环
责任印制: 潘泽新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六辑 (2017 年第 2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1. 75 印张 220000 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8100 - 5 定价: 35.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制度经济学研究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主 编

黄少安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茅于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盛 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邹恒甫

中央财经大学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主办单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目 录

超越新经济史：诺思的学术贡献	刘瑞华 (1)
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布	
——基于 1776 ~ 1953 年间人口数据的实证	汪建雄 (19)
内生制度绩效的跨文化差异	
——基于非物质偏好的分析框架	李志云 朱宪辰 (36)
企业家激励、隐性契约与创业型企业融资	吉 云 (64)
中国情境下企业广告策略与研发战略的逻辑关系	汤二子 (87)
税收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刘伟江 吕 镛 (111)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来自中国 265 个城市的最新证据	辛大楞 辛立国 (128)
失独家庭救助的法经济学分析	韦 倩 刘长硕 李学迎 (142)
EMBA：“圈层租金”与“赢家通吃” 的竞赛	周 鹏 曹冬雪 王 刚 (153)
后记	(179)

CONTENTS

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Douglass C. North's Academic Contribution	LIU Ruey Hua (18)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f Recent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opulation Data of 1776 – 1953	WANG Jianxiong (35)
The Cross – cultural Difference of Endogenously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Non-material Preference	LI Zhiyun ZHU Xianchen (63)
Entrepreneur Incentive, Implicit Contracts and Start-up Financing	JI Yun (8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tising Tactic and R&D Strategy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TANG Erzi (110)
Tax Poli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y	LIU Weijiang, LV Zhuo (127)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 Rural Income Gap —New Evidence from Chinese 265 Cities	XIN Daleng XIN Liguo (141)
Law and Economics Analysis of the Salvation of “The Lost Alone Family”	WEI Qian LIU Changshuo LI Xueying (152)
EMBA: Contests of “Circle – Rent” and “Winner – Taking – All”	ZHOU Peng CAO Dongxue WANG Gang (178)

超越新经济史：诺思的学术贡献*

刘瑞华**

【摘 要】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过世。这位在经济学界引领新经济史革命并且在制度分析有卓越贡献的大师，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学术遗产，以及让人敬仰的典范。本文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历程，以及一生的重要著作，彰显其致力于经济史研究，不断创新的贡献。作者也在文中分享了求学期间跟随诺思教授学习的个人经验，让读者能够感受这位当代学术伟人的启发。

【关键词】道格拉斯·诺思 经济史 计量史学 制度 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一、前 言

诺思这位当代经济史的泰斗级大师，在 1993 年与傅戈（Robert Fogel）共同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的理由是“应用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更新经济史研究，得以解释经济与制度的变迁”。这项奖励不仅是推崇他们两位在学术上的个人成就，还肯定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兴起的新经济史革命。在这场改变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革新过程中，诺思在许多方面都是先驱，而且不断在研究议题上开拓创新，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他更进一步朝向发展研究经济史的理论而努力，使制度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史及经济理论学者的重

* 本文是刘瑞华教授为纪念诺思教授而写的，最初发表于诺思著、刘瑞华译注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国台湾版。刘瑞华是诺思教授的学生，曾经跟随诺思教授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做研究助理，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前言”中曾经提到这一点。刘瑞华教授对诺思的思想有比较深入的学习和理解。这里发表该文是为了纪念诺思教授，也是为了让更多大陆读者更好地理解诺思教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

** 刘瑞华，经济学博士，中国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并曾经担任系主任。E-mail: rh-liu21@seed.net.tw, rhliu@mx.nthu.edu.tw。

要主题。

诺思一直走在学术革命的先锋位置,他除个人的研究工作之外,还努力带动同事与学生,对于教学也很认真。诺思的学术生涯中,主要的教学工作只在两所大学的经济学系,恰巧这两所大学的中文名称一样,都称为华盛顿大学,而两校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分校。1950~1983年,他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任教,之后移往密苏里州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任教。两所大学的名称太像,文献上经常被搞错。他在两校都带给同事与学生很大的影响。^①

1980年诺思在备受礼遇之下,受邀到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任职,不过他并没有特别减轻教学负担,还担负一些额外的任务。教课之外,他每周主持一次政治经济学讲座,邀请外校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更特别的是,每周五中午,他还带一些同事与学生到餐厅,边吃午餐边讨论,进行所谓的“午餐研讨会”。^②学生参加“午餐研讨会”必须经过诺思同意,还要准备被诺思询问最近的研究,压力不小,却是进入学术社群的一种难得的新生训练。诺思用这样的方式,提携年轻的同事与学生。其实在经济系里投入经济史领域的学生并不多,而诺思已经是学界数一数二的大师,却愿意如此付出,这是曾经接受过洗礼的学生毕生难忘的经验。

虽然学者最重要的成就表现在研究与著作,但是诺思的学术贡献不只限于可考的文献。在新经济史星火初燃的年代,他就是革命的导师,继而在编辑《经济史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时带动经济史彻底改变的风潮。而且,在革命逐渐成功之际,诺思又率先针对新经济史缺乏理论创建提出检讨批判。

更鲜为人知的是,诺思不仅在学术工作上有极为杰出的表现,他的成长历程与生活也很精彩。诺思在学术上功成名就,可能让人以为他出身显赫,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并不特殊,工作上虽然有其强势作风,但是平常对人都很客气,而且平易近人。我认为这应该与他很踏实的成长背景有关,想借着本文让更多读者认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学者。

① 诺思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时期的教学,可以参考 Jonathan R. T. Hughes, “Douglass North as a Teacher”, 该文刊于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M. Walton 所编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Academic Press, 1983)。这本书是诺思离开该校之前,他的学生为了感激他的教导与提携所策划,在他离职之后出版,书中除了这篇叙述师生之情的文章,还包括许多彰显诺思学术影响的研究论文。

② 我在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时,从1988~1990年间参加了三年的“午餐研讨会”(lunch seminar)。诺思一直很重视这样的课外讨论,这种教学方式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时期就开始的传统,在我毕业离开许多年之后,才因他年事已高而停止。

二、教育与成长^①

诺思于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小时候家境并不优渥。他的父亲从高中时期开始在保险公司打工实习，逐渐晋升，为了担任管理阶层，必须接受调派到各地工作，甚至国外，因此诺思在成长过程中曾经迁居各地。大学时，诺思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读，他虽然拿到哈佛大学的入学许可，但因为不想与家人远离，而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大学成绩“至多只算平庸”，比较特别的是，当时他自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对照他之后的学术立场，却有极大的差别。

诺思年轻时接触过马克思理论，虽然他后来在思想上彻底转念，但是马克思理论对他的理论体系发展，却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他自己解释，成长于经济大萧条的年代，马克思理论是在凯因斯（John M. Keynes）的理论出现之前，是解释当时经济状况最合理的理论，而且当时他在大学里的朋友，几乎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②

年轻时代的诺思有件事值得一提。诺思在高中时就迷上摄影，得过许多比赛的奖项，甚至受到知名摄影家兰吉（Dorothea Lange）的赏识，在1941年协助她为美国农业部工作。兰吉曾经在大萧条年代拍摄一系列照片，呈现美国中西部农民失去家园与土地而往西部迁徙的景象，这些照片是如今我们认识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影像数据。年轻的诺思在此时不论是透过镜头还是亲眼所见，了解经济穷困的严重性，显然影响了他一生在研究上探索的问题。^③

除了摄影外，诺思在年轻时学会航海，驾驶过大型轮船，也是让人相当称奇的事迹。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诺思和许多美国年轻人一样并不赞成参战，后来虽然因为纳粹德国的作为而接受征召服役，但是因为不愿意在战场上杀人，于是选择加入被征用的运补商船，成为船员。上船不久后，有一天船长把他叫到驾驶舱，认为他的教育程度比一般船员高，要他学会驾驶，以便在旧金山与澳洲往返的航行时可以代理驾驶。诺思非常喜欢一个人在驾驶舱中面对大海，以及因此获得的航海员身份，后来他手腕上一直戴着一只航海员的万年表，而且这段船舰运输的经验，也影响他日后的研究。

诺思在大学时选了经济学、哲学与政治科学三门主修，战后回到学校攻

① 诺思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提供给颁奖单位的简单自传。本文提及诺思的个人说法与生活经验主要根据这篇文章，以及我个人在学期间与他的接触经验。

② 诺思私下曾说过，当时他只是个大学生，思想中热情的成分大于理性。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趟欧洲之行，他决定要把《资本论》第三卷看完，于是选择搭船。到岸时，他把马克思思想留在海上，告别了他年少轻狂的岁月。

③ 诺思还曾经为了该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以摄影为业，还是继续念书，而难以抉择。

读博士学位时，他选择经济学，并且决定以经济史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领域。这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指导老师茂文·奈特（Melvin Knight）。茂文是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①的哥哥，当时法兰克·奈特在芝加哥大学已经是享有盛名的经济学教授，而茂文则是承袭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的学者，对于主流的经济理论很不以为然，经常批评老弟。诺思虽然并未将责任归咎于老师，但是坦承拿到博士学位时，他对经济学理论所知并不深刻。

诺思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美国保险业在20世纪初的变化，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的父亲和叔伯们在保险公司位居要职，容易拿到资料。诺思的论文研究焦点是1905~1906年美国保险业的一个重大事件“阿姆斯特朗调查案”（Armstrong Investigation）。经过国会调查保险营销人员隐瞒重要信息的问题，保险业遭受了更严格的产业管制，业务员被要求必须详细告知保户契约内容。不过，根据诺思的研究，保险业者对于管制措施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事件之后，采取的方法更小心，而且换得跨入金融业务更大的发展机会。^②

诺思在论文里表现出对美国大企业的批判态度，可是却不是简单的“左”派立场。他对于企业家的角色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知道企业家会利用各种机会，政府的管制其实提供给企业家更大的游说空间，让大企业更容易透过政府协助扩大市场、开发业务。当政策造成企业与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又会导致新的改变。这个动态的过程，构成了美国产业发展历史的重要特征。在那个新经济史革命还没开始的年代，诺思已经踏上从政治经济研究制度的途径。

三、革命的岁月

诺思在1950年进入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那时美国的经济史研究正要进行一场巨大的改变。刚开始教书的诺思充满热情，经常对学生提出很具挑战性的问题。他在课堂上与教室之外的讨论，吸引了不少学生投入经济史这个冷门的领域，甚至包括历史系的同好。^③

① 法兰克·奈特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是所谓“芝加哥学派”的创建者之一，早在1921年就出版了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该书强调企业家承担风险及面对不确定情况下做决策的能力，是理解企业家精神的经典文献。

② 诺思私下说，这样的结论，让他在保险公司任职的一些长辈们生气了很长一段时间。

③ 参考 Jonathan R. T. Hughes, “Douglass North as a Teacher”, 该文刊于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M. Walton 所编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Academic Press, 1983)。台湾历史学界熟知的中国经济史学者马若孟（Ramon Myers），当时也在同一所学校，是与诺思讨论的常客。那本书中包括一篇马若孟以私淑弟子的身份所写的文章。

诺思本人与他教导的学生，成为了新经济史革命的一支主力。^① 这场新经济史革命，用经济学理论与统计资料验证的方法，改变经济史原本的面貌。长期受欧洲历史学派主导的经济史教学与研究，讲求博闻强记、注重文体史观；在革命分子眼中，那些论述充满不精确与受怀疑的结论。新一代的经济史，开始对以往熟知的历史知识进行挑战，做各种“反事实推论”（counterfactual）的提问，结果惊人。^②

各地的革命分子很快就联系集结，组成自己的社群，定期召开研讨会。他们还在这场革命创造出一个至今字典还查不到的名词“Cliometrics”（一般的中文翻译是“计量史学”）。两位造字的人，戴维斯（Lance Davis）与休斯（Johnathan Hughes）就是诺思的学生。诺思在新经济史革命中的另一个角色，是他从1960~1966年担任《经济史期刊》的执行编辑之一。掌握了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官方刊物，诺思为新一代的经济史学家提供发表机会，革命因此星火燎原，许多著名的文章出现在这份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官方刊物上。

诺思会在新经济史革命中担任要角，是许多特殊机缘的结果。他自认在求学时并未打好经济理论的扎实基础，是后来在西雅图教书时，连续三年几乎每天与同事高登（Donald Gordon）一边下棋，一边聊经济问题，从与棋友的谈话中了解经济理论。另外，诺思曾经回忆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获得机会到美国东岸，接触哈佛大学教授寇尔（Arthur Cole）带领的企业家学派（Entrepreneurial School），因此受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影响很深。^③ 之后，诺思于1955~1956年有机会到美国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进行研究，让他能每周一次和顾志耐（Simon Kuznets）见面。这段时间他完成了美国1790~1860年贸易进出口的量化分析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诺思仍感念顾志耐指引他研究制度对长期经济影响的方向。顾志耐在经济学界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提出并验证技术变动是

① 当时美国经济史学界的另一位重要革命导师，是哈佛大学的葛盛孔（Alexander Gerschenkron），他著有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2）一书，是经济发展“后发先至”理论的始祖。他的学生孔瑞（Alfred Conrad）与麦尔（John Meyer）合写的“*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分析美国南北战争前拥有奴隶的报酬率，被视为新经济史的起义之作。

② “反事实推论”是指为了探讨某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因此假设其如果不发生，会对历史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此一做法经孔瑞与麦尔（1958）提出，在新经济史革命中蔚为风潮。与诺思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史学者傅戈，就是以“反事实推论”研究美国铁路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而声名大噪。

③ 所谓“企业家学派”如今鲜为人知，寇尔是经济史学界研究工业革命的先驱，后来将研究重心放在企业与企业家的历史上，根据熊彼特所强调创新（innovation）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理论，研究欧美企业的决策与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影响深远。他的学生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将其发扬光大，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建立起利用个案分析教导学生学习管理的传统。

长期经济成长的重要原因。诺思曾在这位师长过世前去探望他，却听到顾志耐说，我们对于经济成长了解得太少，生产因素增加所无法解释的成长，并不能完全归于技术进步。诺思可以感受到前辈对他的期许，制度研究也成为他后来全心努力的重心。

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成为诺思于1961年出版第一本书的基础。《美国的经济成长，1790～1860》（*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一书，探讨美国内战前后的快速经济成长，诺思指出，19世纪中叶之前的成长来自出口贸易、资本流入与区域发展，也就是出口导向的成长模式。这些因素引发国内的专业分工与组织创新，并且累积资本导致教育投资与创新，带来后续的技术进步。接着在1966年，他又出版《美国历史上的成长与福利：一部新经济史》（*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A New Economic History*），延续前书的研究，进一步探讨美国19世纪快速成长的后果。在他看来，19世纪之后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发展，有其历史背景，并且因强调政策与法规的历史分析。

虽然以上提到的两本书出版于新经济史革命的浪头上，但是书中并不依靠大量数字、数据或复杂的统计。诺思在革命阵营中，一直是以应用理论提出历史见解而著称。即使是有限的史料，经由理论分析的应用，也能产生重要的历史解释。新经济史革命带出一篇篇堆积大量统计数字却缺乏历史发现的文章，诺思在许多场合都显露出不耐。1973年他以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身份发表的演说，一改之前会长们客套的风格，对于新经济史的成果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在这篇名为“超越新经济史”（*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4）的文章中，诺思直指经济史学家还没有充分应用既有的理论，更遑论为历史议题提出理论的建树。

在此之前，诺思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①1968年的这篇文章发现，从17世纪到19世纪，海洋运输的成本下降非常明显，诺思提供计算数据说明其来自生产力的提升，1600～1784年生产力缓慢增加，而1814～1860年则呈现约前两个世纪十倍的成长率。原因是什么？最常用来解释生产力上升的原因为技术变动，可是诺思认为技术并不足以解释这么长时间的变化，他开始寻求其他包含历史过程的答案。

诺思发现，两个世纪里海洋运输生产力的增加，主要来自船员减少、装货量提高，以及停留港口时间的缩短，背后最关键的原因，是海军压制了原本猖獗的海盗，使得货运船上不必安装火炮与配备士兵。后期随着欧洲移民新大陆的人口增加，往返新旧大陆之间的货船，除了从新大陆运回物产，也能将制造品运往新大陆。货船不必经常空船返航，又有更多港口停靠，可以

^①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185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5): 953-970.

进行转口运输、三角贸易，生产力当然大增，而且商人也愿意加大货船的载货容量。如果说技术进步，诺思认为天文与水文知识随着航海经验增加，被有效利用于确定方位与加快航行速度，才是当时最重要的技术进步。

此时诺思不满足于轻易利用技术因素解释生产力或效率提升，而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技术与制度的互动过程。了解新经济史革命的学者看得出来，诺思这项研究是另一次革命力量的展现。^① 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单是得出因果，还应包括过程的解释，而且不论是公共财（打击海盗的政府海军）、市场扩大与贸易网络（新大陆移民的扩展）或者知识（航海经验），都是日后诺思迈向制度研究的要件，这显然是诺思研究生涯的转折点。当年在船上的时光，应该在诺思心里留下了浩瀚的灵感。

四、新制度主义

诺思认为他的学术研究生涯改变，发生在 1966 ~ 1967 年之间，那一年他获得研究经费到瑞士日内瓦，准备从美国经济史转而研究欧洲经济史。这段时期他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不足以提供经济史所需的分析工具，于是开始认真思索新的理论工具。诺思对于理论的探索，也因为他对新经济史革命有所反省。诺思日后经常比喻新经济史革命像是摇晃苹果树，把树上的烂苹果淘汰，可是对于好苹果的生长并没有很大的贡献。要让经济史的大树长出新的苹果，需要灌溉养分。诺思发现的新养分，就是交易成本与财产权。^②

交易成本虽然早在寇斯（Ronald Coase）1937 年的文章中被经济学界所认识，^③ 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发展成理论。后来寇斯受聘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开始为新创的期刊积极写作，^④ 才让人们再次见识到交易成本的另一面。^⑤ 从寇斯 1960 年的文章中还诞生了“寇斯定理”（Coase Theo-

① Claudia Goldin 在 1995 年所写的“Cliometrics and the Nobel”，*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2): 191 - 208，评述诺思与傅戈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特别强调诺思的这一篇文章，认为其与傅戈的美国铁路研究具有同等的学术价值。

② 张五常在 1969 年来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成为诺思的同事，对于诺思的学术理论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③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4 (1937): 386 - 405.

④ 芝加哥大学创办的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开创了法律经济学，期待寇斯担任编辑的责任。寇斯不仅不负所托，也在该期刊上发表许多重要文章。

⑤ 简单地讲，1937 年寇斯提问为何会出现厂商，以交易成本作为答案，指出交易成本的确存在，经济学必须考虑这项因素，而寇斯在 1960 年则以“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3 (1960): 1 - 44 一文，指出财产权的重要性，以及财产权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rem),^① 这个极为有名的理论并非寇斯所要强调的, 关键点在于, 寇斯指出财产权界定清楚可以减低交易成本。

诺思发现交易成本与财产权理论, 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有极大的帮助。回到寇斯最根本的看法, 厂商出现是因为利用市场的成本(交易成本)相当高, 于是厂商取代了市场, 然而这是现代经济的现象。如果把关注焦点放在市场不发达的时代, 交易成本最有可能就是市场经济无法产生的原因, 而缺乏清楚的财产权, 正是造成交易成本阻碍市场的原因。

现在回顾这样的理论, 看起来顺理成章, 交易成本与财产权应该是最适合用来研究历史结构与发展的理论。可是在当时的经济史学界, 革命的力量都投入在“反事实推论”与计量方法的应用, 设法推翻既有的历史解释, 诺思可以说是第一位努力寻找新理论提出新的历史解释的经济史学家。诺思写过许多篇回顾与展望新经济史革命的文章, 大部分的论点都是对外宣扬革命的理想, 对内则严格要求新一代的经济史学者应该应用理论、建构理论。经济学并不只有价格理论, 经济史必须加快速度, 赶上经济理论的进步。

其实诺思开始接触交易成本与财产权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必须从中发掘出处理历史动态的分析工具。1971年他与戴维斯合作出版《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成长》, 这本书的论点部分来自诺思的博士论文, 不过整体来说, 重点在于解释美国的经济成长, 强调制度创新是主因。在已有的制度之下, 当获利机会不能充分被利用时, 就面临制度改变的时机。成功的制度改变经过财产权的重新安排, 得以降低交易成本。

在前一年, 诺思与戴维斯就发表过一篇同名的文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该文的副标题是“迈向一个制度创新理论的第一步”。从后续发展来看, 那的确是第一步, 因为严格来说, 那时连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制度理论都还没有。不过, 诺思就是有如此的先见之明, 他已经看到交易成本与财产权能为经济史长出开花结果的大树。这个学术领域发展的结果, 就是“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或“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的诞生。

虽然诺思可能是在这个领域中, 最早将“制度”与“制度变迁”界定为学术词汇的人, 但是新制度主义的诞生, 不能完全算是他的功劳。寇斯早已提供理论基础, 只是寇斯的研究方法不爱建构理论, 也不爱用学术专业名词, 在所写的文章中并不常用到“制度”一词。其实寇斯本人连交易成本这个词汇都很少用。不过, 新制度主义的确发展起来。1991年寇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发表的得奖演说用的标题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① 所谓“寇斯定理”, 简单说就是, 如果交易成本为零, 私人协商可以解决外部性(externality)的问题。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1992)^①，宣告新制度主义的成功。

新制度主义顺理成章地在经济学界诞生，原因应该是原本存在的制度主义逐渐消沉。制度主义也称制度学派 (Institutional School)，是在经济学古典学派之后，各学派百花齐放时代诞生在美国的一个学派。从 19 世纪开始，延续古典学派的英国经济学界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化，建立起以供给与需求分析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这样的发展引起许多学术争论，各种学派纷纷崛起，挑战新古典理论。不过，经济学界后来还是由新古典理论取得主流地位。

制度学派在 19 世纪的美国蓬勃发展，其特色在于一方面接受德国历史学派主张的归纳方法，强调经济问题在各个社会中的特殊条件；另一方面采取演绎方法，对于社会条件的结构予以理论化。制度学派的理论以类型化的描述方式为主，和新古典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分析的方式明显有别。值得一提的是，很早就有制度学派学者对新古典理论个人主义的假设提出质疑，并且试图对集体行动 (collective actions) 建立理论进行分析。只是由于缺乏易于操作的分析工具，制度学派到了 20 世纪中叶已经逐渐势微。

寇斯提出理论的动机虽然是挑战主流经济学，但是目的并非要推翻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似乎不曾引起当时制度学派学者的注意，反而是最主流的芝加哥大学对他甚感兴趣。虽然寇斯到美国后安身于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作风也与一般经济学家不同，但是一直未改变他经济学家的身份。之后继续努力发展交易成本与财产权理论的学者，也包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

新经济史革命当初就是从经济史学界原本受历史学派笼罩的传统中，迎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运动，当时美国制度学派的学术影响力已经不再，在新经济史革命过程中并未占有重要地位。诺思对制度学派的著作应该不陌生，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大型企业的管理问题，其实是制度学派关心的问题，可是却很少在文章中提及他受到何种影响。即使当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高举构建制度理论的大旗时，想法与做法都和制度学派关系不大。

相较之下，新制度经济学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还更近一点，这使得诺思从新经济史跨向研究制度的做法非常顺利，在他看来，他的制度研究的根本就是新经济史。1973 年他与托马斯 (Robert Paul Thomas) 合写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出版，这本根据财产权理论分析欧洲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著作，副标题就是“一部新经济史”。《西方世界的兴起》在经济史学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其实是它并不像当时大家熟悉的新经济史，充斥着理论模型与计量分析，正因如此，这本书在历史学界也有很多读者从许多方面看，是一本引起广泛讨论的著作。全书内容几乎都是根据二手史料，引用的数量

^①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4): 713-719.

资料并不多。书的题目是西方兴起,整本书的内容停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除了在欧洲经济史著作中最常讨论的英国、法国之外,这本书还特别强调了荷兰与西班牙的发展。因为有四个国家的比较,这本书里讲述的西方世界并不全是兴起,还有区域间的兴衰变化。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本书主张欧洲经济成长的原因是制度,是历史过程导致的制度创新。

正如诺思自己所言,从美国史转向研究欧洲史是他的重大转变,有些困难要放到当时的环境来理解。首先,新经济史革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全是美国人的事,写的也都是美国的事。即使是与美国学术发展脉动相连的英国,在70年代也很少有新经济史的研究。^①即使是诺思这般的有名的美国学者,也不容易踏进欧洲版图。

《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内容,至今都还会让许多读者称奇,在当时更是一场新经济史革命的胜利。如今稍微熟悉经济史的学者都会承认,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产生市场经济的关键条件。诺思教授上课时,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制度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就是由这本书奠定的。本书还在2000年入围EH.net评选的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史著作。^②同时诺思还有另一本书也入选,那就是1981年更让人大开眼界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开头,诺思表明并不是要建立一套历史理论,可是看得出来,他有这个企图心。更早一点诺思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结构与表现:经济史的任务”(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e Task of Economic History)(1978),^③诺思在这篇文章里,开始提出他所勾画的经济史理论架构,而且是以可与经济理论兼容的方式。他写下,如果经济理论是研究人类如何在限制条件下做选择,那么经济史就是研究那些限制是怎么来的。

在1978年所写的这篇文章里,诺思告诉经济学家,许多限制是人为创造的,也会随着时间改变。经济行为的限制条件会以结构方式持续一段时间,影响经济活动的表现,而经济表现又会酝酿结构改变的原因,在适当条件下造成结构的改变。这是诺思所宣示经济史的任务,也是他写作《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最重要的目的。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之中的许多理论内容,在出版前已经发表过,即使如此,这本书的出版还是令读者惊讶。整本书的结构相当偏重理论,而且一如诺思其他的著作,篇幅不长,仅占一半的历史分析却涵盖西方几千年的发展,而且引用的史料可以说相当少。这样大胆的做法,若非有诺思的地

① 至今都还可以看出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和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在风格上的差异,这两份分属于英国经济史学会与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刊物,在当时差别更大。

② 这个网站是由英美几个重要的经济史与企业史学会赞助。

③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6 (3): 963-978.

位，恐怕很难招架批评，而这样有前瞻性的著作，也必须是出自诺思这样的大师。实际上，这本书出版时受到不少质疑与批评。不过，当时很前卫的见解，三十几年之后，依旧经得起考验，这本书已经被公认为当代数一数二最重要的经济史著作。

这本书的分析架构包含经济学所知的各种动态因素，人口、资本、技术，以及特别强调的制度。利用这个架构，诺思对许多既定的历史认知提出革命性的新见解，至今这些新的历史观点仍被学术界讨论。传统认知的农业革命，在诺思看来，并非技术发明的革命，而是建立财产权所创造出的“第一次经济革命”，之后西方发展至罗马帝国所经历的国家政治演变，是经济革命的后果。封建经济的兴起与衰落可以从交易成本的变化得到解释。众所公认的18世纪工业革命，在诺思眼中竟然不是革命，而是15世纪以来市场扩大的后果，真正的革命是从19世纪才开始发生的。^①

出版于1981年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其中的有很多内容到现在仍会让初次阅读的读者感到惊讶，让许多资深学者无法接受，却又难以反驳。如果不愿接受诺思试图掀起的重大挑战，最好的推托之词就是书中许多见解都还未经史料与统计数字的检验。这些看似基于计量史学的学术标准所提出的辩护，其实已经成为反革命的保守势力。这显然让诺思相当不耐，他虽然还是要求学生拿出更多研究制度的成果，^②但是不会受制于烦琐史料的牵绊，而是继续努力于理论的推进。

接下来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是一本更偏重理论的著作，不过其探讨的历史问题还是很清楚。诺思问，为什么即使经过很长的时间，富有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差距依旧悬殊？这个原本属于经济发展的议题，对经济史学家而言，时间因素的加入更让问题难以理解。为何经过那么长的时间，贫穷国家还学不来呢？如今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关键在于制度。制度是什么？这本书在1990年开启了一场新的革命。

与诺思之前的看法比起来，这本书对制度的理解显然受到赛局理论（game theory）的影响，甚至在一开始他就以最简单的方式解释制度就是“游戏规则”（rule of game）。从新经济史革命开始，诺思从来不掩饰他边做边学的做法，赛局理论是他当时积极学习的新工具。除了考虑人的行为互动外，为了分析制度变迁，诺思进一步把厂商理论延伸出来的组织理论加上改变制度的功能。组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寇斯著名的创见，至于如何降低交

① 诺思称其为“第二次经济革命”（The Second Economic Revolution），他认为这场革命是新石器时代发生的“第一次经济革命”之后的另一个新经济结构，在这个经济结构中，技术创新是以组织化方式进行的，因此不断出现快速的技术变动，也因而必须有制度变动的配合。

② 诺思经常感叹他没有“傅戈大军”（Fogel's Army），那是指傅戈在芝加哥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有许多研究人力，协助处理大量数据，这让我们一些当时在他身边的学生相当汗颜。